

宋代文化

研究

(第十三、十四辑) 上

四川大学「儒藏」学术丛书

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
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PDF

宋代文化

研究

(第十三、十四辑) 上

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
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何 静
责任校对:张振刚
封面设计:丁 丁
责任印制:杨丽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文化研究. 第十三、十四辑 /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,
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. —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
社, 2005.9

(四川大学“儒藏”学术丛书)

ISBN 7-5614-3246-1

I. 宋… II.①四… ②四… III. 文化史 - 研究 -
中国 - 宋代 IV.K244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7833 号

书名 宋代文化研究 (第十三、十四辑) (上、下册)

作 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
·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
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 140 mm×202 mm
印 张 26.375(上、下册)
字 数 61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0 001~2 500 册
定 价 60.00 元(上、下册)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www.scupress.com.cn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成立二十周年紀念

目 錄

| | |
|--|-----------|
| 《左傳》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| 徐中舒 (1) |
| 《全宋文》序 | 繆 錄 (35) |
| 《文心雕龍》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 | 楊明照 (40) |
| 譙定、張栻與朱熹的學術聯係 | 胡昭曦 (85) |
| 《集韻》的版本和整理 | 趙振鐸 (112) |
| 奉陽君考 | 繆文遠 (124) |
| 論《全宋文》 | 曾棗莊 (136) |
| 論東晉南北朝道教的變革與發展 | 劉 琳 (159) |
| 蘇詩舊注補正 (七) | 馬德富 (196) |
| 敦煌本俄Phi242《文選》寫卷校證 | 羅國威 (210) |
| 司馬相如作品的新解讀與定位 ——必須提升司馬相如的文學地位 | 劉文剛 (257) |
| 王安石的文字訓詁學 ——北宋新學學派之個案研究 | 李文澤 (276) |
| 論兩宋御史臺之建置及其特色 | 刁忠民 (290) |
| 《明儒學案》點校說明 | 郭 齊 (322) |
| 宋太宗雍熙北伐綜評 | 王曉波 (334) |

-
- 《釋氏疑年錄》宋代部分補考 李國玲 (361)
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著錄圖書失誤的十五種類型 沈治宏 (371)

- 試論宋朝的羈縻州管理 郭聲波 (386)
 《儒藏》編纂之分類體系初探 舒大剛 (397)
 漢代災異學說與儒家君道論 楊世文 (423)
 吳氏世將與南宋政治 王智勇 (438)
 亦僧亦儒更爲人
 ——釋道璨生平及親情作品初探 黃錦君 (457)
 宋詞創作本源研究之一：美人情結 向以鮮 (475)
 尤袤詩名及其生卒年解析 吳洪澤 (488)
 南宋初州縣省廢及其原因述略 李勇先 (499)
 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 尹 波 (517)
 標點本《宋史》訂誤 王蓉貴 (539)

中國古代詩學話語言說方式及其意義生成

- 《詩經》與中國詩學關係研究 李 凱 (552)
 以古文爲四六
 ——歐陽修對宋四六的開創之功 施懿超 (571)
 清修省志述略 林 平 (595)
 《輿地廣記》的地名學價值 王小紅 (608)
 錢惟演試論 池澤滋子 (629)
 蘇軾詞四首編年考 保刈佳昭 (651)
 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“受容”及其蘇東坡觀
 曹圭百 (666)
 王荊公《易解》考略 金生楊 (686)

-
- 歐陽修的民族思想及政策述評 楊然 (705)
古籍電子化問題探析 張尚英 (717)
宋代成都府（益州）路政區沿革考述 李中鋒 (730)
蘇轍“二周說”述評 李冬梅 (754)
三孔文藝思想淺論 李春梅 (763)
論類書的界定 王利偉 (772)
王明清《揮麈錄》考述 霞紹暉 (789)
讀中華書局校點本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札記 李曉珏 (799)
齊地“鄙陋輕義”民風淺論
——元·于欽《齊乘》“風土篇”讀後 韓麗梅 (810)

建所創業第一年

- 回憶二十年前川大古籍所的創業 胡昭曦 (817)
宋代家族研究論著目錄續一 粟品孝 (822)

附：大型項目及成果名稱

- 《宋人年譜叢刊》 (84)
《中古泥鴻》 (111)
《宋代文化研究》(2~12) (158)
《朱熹集》(全十冊) (209)
《諸子集成》系列 (289)
《儒家德治思想探討》 (360)
《黃庭堅全集》(全四冊) (370)
《中華大典·宋遼金元文學分典》 (437)
網絡版《宋會要輯稿》 (456)
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·宋代卷》 (474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全宋文》 | (487) |
| 歷代學案 | (551) |
| 《儒藏》 | (594) |
| 《宋代語言研究》 | (628) |
| 《朱熹詩詞編年箋注》(上、下冊) | (665) |
| 《唐宋文學研究》 | (685) |
| 《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》 | (704) |
| 《宋僧錄》(上、下冊) | (762) |
| 《三蘇全書》 | (788) |
| 《宋集珍本叢刊》 | (798) |
| 入宋傳法譯經僧法賢爲法天天息災二僧考辨 | (753) |

徐中舒

徐中舒先生（1898—1991），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，部評一級教授。中國史學會理事、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、中國古文字學學會常務理事、中國考古學會顧問、四川省歷史學會理事長。

徐中舒先生為安徽懷寧（今安慶市）人。出身貧寒，刻苦自學。1917年畢業於安慶初級師範學校。1925年考取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，師從王國維、梁啟超、趙元任、李濟。1929年受聘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歷任編輯員、研究員。1938年受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，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，1946年起擔任歷史系系主任職。1927年至1949年，先後兼任過暨南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武漢大學、華西協和大學、燕京大學、中央大學等校教授。1948年入圍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先生除繼續任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，擔任系主任、名譽系主任、古籍整理研究所首席顧問外，還兼任過西南博物院院長、四川省博物館館長、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，曾多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。

徐中舒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科研和教學，他師承王國維的“二重證據法”，融古代文獻學、古文字

學、考古學、民族學、古器物學等學科知識於一爐，在中國先秦史和古文字學研究領域多有建樹，同時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也有較高的造詣。20世紀30年代初，他主持中國首次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，并寫成了《內閣大庫檔案的由來及其整理》等文，成為我國現代用科學方法整理歷史檔案的開端。《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》、《耒耜考》、《再論小屯與仰韶》、《古代狩獵圖象考》、《陳侯四器考釋》、《金文嘏辭釋例》、《幽風說》、《井田制度探原》、《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》、《巴蜀文化初論》、《巴蜀文化續論》、《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》、《論〈戰國策〉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》、《〈左傳〉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》、《論商於中、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》、《怎樣考釋古文字》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。1932年，中國現代史學的開創者之一傅斯年先生在致蔡元培函中提到：“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極重之大發現，其所撰狩獵圖考一文涉及古代文化之遷流，多人所未道。”40年代中期，“古史辨”派主將顧頡剛先生評價：“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上的成就，……可謂直探奧秘。徐中舒先生對於金文亦有極深邃的研究，所涉範圍甚廣，其成就僅次於郭沫若先生而已”。80年代初，顧頡剛先生在讀了徐中舒先生新作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》後認為：“如此治學，然後可以直探造字本原，不為舊說所迷惘。”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亦稱其“六書說很多創見，為前人所不及”。在先生九十壽辰之際，老友周谷城先生祝辭云：“先生

學問，博大精深。著作創造，精密絕倫。講學授徒，七十年整。影響所及，遐邇咸欽。”先生一生論著逾百篇（部），《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》收入其中 60 篇；晚年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《漢語大字典》和《甲骨文字典》等多種工具書。

《左傳》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

《左傳》是以《春秋》爲綱的編年史。相傳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左丘明爲之傳。先師所言爲經，後師所言爲傳，這是過去的經學傳統。《春秋》和《左傳》是史學，把史學當作經學處理是不是恰當呢？《春秋》是魯國國史，不是孔子家傳，而今《春秋經》一本（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本）記孔子生年，一本（《左傳》本）記孔子卒年^①，孔子如作《春秋》，記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當呢？他又怎能預知自己的卒年呢？左丘明是孔子同時人，曾親見孔子，而《左傳》作者能預知三家分晉、田氏代齊，這兩件事都遠在孔子以後。孔子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，而三家分晉在公元前四〇三年，距孔子沒已七十七年；田氏代齊在公元前三八六年，距孔子沒已九十四年。《左傳》作者不但能預知三家分晉、田氏代齊，又能斷言鄭國先亡或鄭先衛亡，鄭國滅亡在公元前三七五年，距孔子沒已一百零四年。這些歷史都不是孔子同時的人所能前知的。據此言之，《左傳》成書的年代必遠在孔子以後。春秋時代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”，就是周天子也不能違反霸主的意志發佈政令。孔子對於這樣現狀是不滿意的，他慨嘆地說：“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”^②他在夢寐中都想恢復周公時代“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”的局面。孔子時代公山弗狃以費畔，佛肸以中牟畔^③，

在孔子看來，他們都是“欲張公室”而反抗“禮樂征伐自大夫出”的人，可以說是一種起義，所以他們要召用孔子時，孔子也是想去應召的。但是，《左傳》作者對於這種看法，就是不贊同的。在《左傳》中一則曰：“我家臣也，不敢知國”，再則曰：“家臣而欲張公室，罪莫大焉！”^④孔子時代周王朝已經是越來越衰弱了，孔子要恢復天子的君權，把希望寄託在這樣一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上，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空想。《左傳》作者則不然，他從實際出發，肯定了當時掌握實際君權的卿大夫，而這一級君權繼續發展之後，就成為後來的三晉和田齊，《左傳》作者在理論上就是要準備為這幾個新興僭主服務的。據此而言，《左傳》成書年代及其所反映的意識形態，都與左丘明的年輩不合。這些問題，過去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。

清代經學雖然超過以往任何時代，但因為這些問題沒有解決，也為後期今文學家造成一種錯覺。他們在前期學者論定偽《古文尚書》^⑤的基礎上，誤以為古文大都皆偽，而以《周官》、《左傳》二書作為最典型的例證^⑥。一唱百和，衆口一辭，《周官》、《左傳》二書從此也就蒙上了一層濃厚的灰塵了。其實漢代的古文書與東晉偽古文，顯然是有區別的。《漢書》稱河間獻王承秦火之後所得皆先秦古文舊書，其中有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屬^⑦，《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既然沒有問題，為什麼《周官》獨成偽書呢？河間獻王在河間國內又立了《左氏春秋》博士，《左傳》在河間必已廣為流傳，這哪是後人所得偽造的呢？東晉所傳偽《古文尚書》雖然也託言出自西漢孔安國所傳，實際上孔安國所獻的壁中書，遭巫蠱倉卒之難業已失傳，而且它也祇有十六篇^⑧，與偽《古文尚書》二十五

篇之數不合，內容那就更不必說了。

為了幫助讀者解決這些問題，下面分列十章敘論。

一 《左傳》的名稱

《左傳》是《春秋左氏傳》的省稱，西漢時代初無此名。司馬遷作《史記》說魯君子左丘明成《左氏春秋》^①，河間獻王立《左氏春秋》博士，他們都稱此書為《左氏春秋》。劉歆《讓太常博士書》也祇說“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”，及兩漢之際《左氏》一再立於學官^②，班固作《漢書》乃有《春秋左氏傳》之稱。以傳解經，這完全是漢代學官的體制。

西漢時代通行隸書，稱為今文，而稱秦時所罷斥不用的“言語異聲、文字異形”的六國字體為古文^③。《春秋》三傳：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雖傳自先秦而實寫定於漢代，皆以今文立於學官；《左傳》為秦火以前遺書，多存古字古音，因此，又有《春秋古文》^④或《古文春秋左氏傳》之稱^⑤。

二 《左傳》與《春秋》的關係

《春秋》和《左傳》是中國編年史的鼻祖。《左傳》有無經之傳及經傳相異的記載^⑥，這正是歷史學者信以傳信、疑以傳疑的謹嚴態度。但是，這樣的傳就不合於漢人以傳解經、傳不違經的

通例。《晉書·王接傳》說：“接……常謂《左氏》辭義贍富，自是一家書，不主爲經發，《公羊》附經立傳，經所不書，傳不妄起，於文爲儉，通經爲長。”西漢今文博士“謂《左氏》爲不傳《春秋》”，《左傳》是史學，“不主爲經發”，它與《公羊》“附經立傳，經所不書，傳不妄起”體例絕不相同。據《左氏》於經傳之外，於《左氏》並無任何損傷，但謂《左氏》不爲《春秋》史事作傳則大爲不可。桓譚《新論》說：“《左氏》經之與傳，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，經而無傳，使聖人閉目思之，十年不能知也。”後人好言《春秋》書法，《春秋》書法，若無《左氏》詳載其事，桓譚以爲聖人閉目深思、十年不能知的道理，後人又怎能知其微言大義所在呢？經而無傳說它是“斷爛朝報”^⑩也就不爲過論了。葉夢得《春秋傳序》說：“《左氏》傳事不傳經，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；《公羊》傳義不傳事，是詳於經而義未必當。”《朱子語類》也說：“《左傳》是史家，《公》、《穀》是經學，史學者記得事却詳，於道理上便差；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，然記事多誤。”^⑪宋人分別經、史二科以調停今古文的爭論。其實，離開了具體歷史實際，在義理上又能作出什么功績呢？

經學問題，現在可以說已經從根子上解決了。唐代劉知幾以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爲史，清代章學誠以六經爲史^⑫，六經中不但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是史，就連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詩》、《樂》也是人類社會的記錄。今日言之，六經就是古代的史料。

《春秋》原是朝報、邸抄一類的原始記錄。《禮記·坊記》及《韓非子》引述《魯春秋》共有四條^⑬，皆與今《春秋經》同。可見今《春秋經》即《魯春秋》，其間並無孔子筆削的痕迹。《孟子》說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”^⑭，司馬遷祖述其說^⑮，

兩千年來幾成定論，然其說實不足信。《春秋》應是魯史舊文，其中如“郭公”、“夏五”^①之類，都保存了原來的缺簡，但在長期轉寫流傳中，也難免有一點改動。《公羊傳》說：“不修《春秋》曰，‘雨星不及地，尺、而復’，君子修之曰，‘星實如雨’”。《春秋》舊文“雨星不及地，尺、而復”^②語詞冗贅，今《春秋經》“星實如雨”也只在文詞方面加以修改，並無微言大義可言。又如孔子沒後孔門弟子爲紀念孔子之故，在《春秋》中或記其生年，或記其卒年，以志其尊崇仰慕之誠；《春秋》的流傳出自孔門，《春秋》記孔子生卒即應出自孔門弟子之手。司馬遷說：孔子“爲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”^③，孔門弟子却没有這樣信念。

《春秋》是魯太史世代相續，按年、時、月、日秉筆登記的檔案，魯昭公二年（公元前五四〇年）晉韓宣子聘魯，在魯太史處見到此書^④。《春秋》終於“獲麟”或孔子卒（公元前四八一年或四七九年），其間尚有六十年的歷史還要魯太史繼續編寫。孔子哪能取未曾公佈的國史遽加筆削？《春秋》書法也應是太史的職責，齊太史爲了直書崔杼弑君之罪，兄弟相繼以身殉職^⑤。書法必須有廣大的輿論支持，形成一種社會制裁力量，然後才能使亂臣賊子懼。《春秋》書趙盾、崔杼弑君之罪^⑥，原是晉、齊太史的筆法，有晉、齊兩國輿論的支持，因此魯太史才同意晉、齊太史的書法而轉錄於《魯春秋》中。同例，《竹書紀年》中有許多書法與《春秋》同^⑦，也是魏國史官審知當時輿論無異詞而轉錄於《紀年》中，若說孔子作《春秋》僅取已往歷史陳迹加以筆削，這樣的“死後是非”又有何用呢！《論語》載孔子生平言行甚詳，其中論《詩經》最多，對於《春秋》則不見隻字。孔子

時代《春秋》還是魯國祕藏的國史，韓宣子也祇在魯太史處見到此書，孔子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利用這本祕藏的國史進行筆削。

三 《詩》和《春秋》在孔門傳授的次第

孔子時代《詩經》除《商頌》外都是周部族內部經常演奏的樂章。《雅》、《頌》是西周的詩，僅沿用於統治階級之間^②；《國風》是國人之歌，“用之邦國”，“用之鄉人”^③，通用的範圍也祇限於邦國和鄉人，他們都是周部族內部的人。孔子說“不學《詩》無以言”^④，“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猶正墻而立”^⑤。當時諸侯燕饗及鄉飲酒，賓主酬答，無不歌《詩》以見志，不學《詩》就不能歌優美的詩篇，或斷章取義以表達自己的意願；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就要孤立於部族之中，也與正墙面而立無異。孔子時代《詩》在周部族間還要經常發揮興、觀、羣、怨的作用^⑥，使部族內部的意志情感得到通暢和鼓舞。孔子重視詩教，原因就在於此。

戰國時代社會各方面都起了顯著的變化。首先是三家分晉、田氏代齊，使周部族中兩個最大的霸國亡國絕世了。春秋時代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”，霸主還要存亡繼絕，仗義執言，維護西周以來的封建舊秩序。陳恒弑其君，孔子還要沐浴齋戒向魯哀公聲請伐齊，魯哀公很明白，他知道魯國沒有伐齊的力量，推脫說，你告訴執政的三家吧^⑦！戰國初期周部族中的霸主都不存在了，還有哪一個強國能仗義執言，爲周王朝討伐這幾個僭主呢！孟子